

孙晓磊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见证风雅

JIAN ZHENG FENG YA

9

- ◎ 思想资源的深度开掘
- ◎ 艺术观念的卓尔不群
- ◎ 语言形态的创新超越



文学评论集

很多时候，精神的期许、守望和坚持比什么都重要。坚持文化的操守，用心灵和情感去写作，使文字透视存在、促使沉思、张扬个性。

评出作者最独到隐秘的思想所在和文本的伦理指证，显现出逻辑力量和洞悉人心的穿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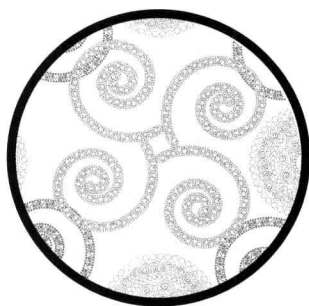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孙晓磊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见证风雅

JIAN ZHENG FENG YA



文学评论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风雅/孙晓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见… II.①孙… III.①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文集 IV.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32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印张 216.5
总字数 3173 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斗争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 001 周同宾乡土文学的精神指向
- 017 文章太守:守护世道人心
- 027 文化行者的文学梦幻
- 044 寥廓江山的华丽歌者
- 056 马本德的城乡现实观照
- 069 沉郁与救赎
- 084 王晋康——一个耽于科学精神的殉道者
- 100 尝试更多艺术形式的创造者
- 111 《见证风雅》——正义有问必答
- 120 蓝风之忧患意识
- 133 欲念中的神性期待
- 137 转换形式 超越自我
- 141 突破爱欲城堡 实现自我提升
- 143 《无名桥》对中国现代农民生活的文化解析意义

- 147 见证民俗的记录者
- 149 偏居一隅的文坛怪才——王俊义
- 158 明远与《见证风雅》之问答
- 165 二月河——再塑历史精神的一种象征



↳ 周同宾乡土文学的精神指向

南阳当为人类起源地之一。正史有载,自四五十万年前的南召猿人在此落地生根后,从春秋战国以降的申、吕之国到秦王朝设置南阳郡,从楚文化的生成到东汉帝乡之陪都的确立,南阳从来都因地域和人才辈出而显示出作为中国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应有风采。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和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南阳也逐渐成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汉文化的荟萃之地,并在中国南北交会带上形成和发展演变出独具魅力的南阳盆地文化。这种盆地文化的孕育完善过程,历经沧桑、见证历史,既带有荆楚之瑰丽魅惑、洒脱飘逸的气韵而富于开放、灵活的可塑性,又兼具中原之包容厚重、求本清源的正统而惯于保守、闭塞和故步自封,蕴涵着超乎寻常地吸纳和排斥新鲜事物的潜质。在历时的传统走向共时的现实语境的不断扩张中,南阳盆地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异质审慎、同化、融合而后生发出新质的复杂而又莫名的不确定性,体现着楚风汉韵丰富而又独特的人文内涵,影响着文化人格的锻造过程以及文化形态的生成模式、结构方式和发展方向。

在历史走向更高文明的同时,因地缘优势和文化遗产的缘由,南阳在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互动发展中,造就了包括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和智圣诸葛亮在内的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与之相连,南阳的文脉气势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高领先、贯通古今,远的如范晔、岑参,尤其在当代,冯友兰、李季、姚雪垠、乔典运、二月河、周大新、柳建伟、田中禾、马新潮等,也都是在南阳这片热土上喝着故乡水脚踏实地地成长起来的。而且单

就这种适宜滋养文人的外在的文化环境来说古今亦然。所以,在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淀中,先贤们的经验世界、秉性人格自然要在承接南阳的文脉地气和风土人情中,强化并传承给南阳的后学之人,为后来者生长、发展、壮大、提高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在当代,从个人气质到道德文章,最能体现南阳文化精髓的当属谨言慎行、文如其人的周同宾先生。他作为有着较强独创精神的作家,集传统思想与现代理念于一身,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典型地透出南阳人的睿智与朴实、顽强与谦逊、坦诚与善良,映照出南阳本土文化的个性特色。他气质文雅,内敛致中,率真且不事张扬、随和而学有所养,中规中矩、不偏不倚,一派知识分子的清癯洒脱之气。

有人认为:“一种作家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作家用灵魂和血肉写作。”这种划分未必十分科学,尤其是有点二元对立的意思而令人难以接受。但若换一种角度,权当一家之言而领悟的时候,我欣赏和羡慕前者,但更敬重和认同后者。因为既然是以文字向社会发言,那么应该具备超乎常人的思想智慧自不待言,若又能“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岂不更富于生命意识的生动性、创造力和真实感,更容易实现创作主体与读者的沟通交流而引起更大的共鸣。固然,文学的样式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但内容的意义更为必要,尤其隐含在文本中的灵魂是更为根本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富有生命体验的终极人文关怀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本的价值体现。

以写作散文安身立命的周先生,似乎更应当算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作家。他的散文本真、质朴,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充满温馨温润感,是一帖寻找精神家园、救治思乡怀故情结的心灵安魂剂。因为,任何时候,只有“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一个人也更接近自己的灵魂”,反过来亦然。人类社会最初萌生的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留下清晰的文化遗传的印记,是因为这种来自乡村的印记才是我们记忆因子的发源地。所以,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大多都天然地依恋和向往田园风光,土地、村舍才是更有亲和力和值得人们追忆、遐想的灵魂栖息地。而城市除了建筑的风格或许会稍稍勾起人们记忆的思绪,大量复制和雷同的钢筋水泥、沥青路面则更多的会是拒绝亲情的召唤而稍显冷漠。其实,人工雕琢味越浓的地方越无从唤起更多的



文学意蕴。

而周先生的散文,尤其他更多的农村题材的散文,道出了人类朴素的情感,说出了农家的世情冷暖。他说:“我身上,环流着农民的血液”,“我是农家子,吃红薯饭长大,穿粗布衣成人,对农村和农民,一直怀有一腔挚情”,“农民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是非标准、文化观念、审美趣味,深深地影响了我”。由此可见他对农民的一往情深。正是最大限度地传承了农民的血脉才孕育了他的文化人格,是农村的乡土气息营造了他的精神家园,是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塑造了他的从容气度。从农民思维的起点出发,他对农村风土习俗的熟稔,对国人情态风貌的把握及其信手拈来、驾轻就熟的文字创造,成为抵达他著书立说创作彼岸的一叶方舟,这种不期而遇的宿命,使他的文本深刻地体现出他灵魂得救和对土地朝拜的文化寻根意味。

矍铄、儒雅的周先生,1941年出身于南阳社旗县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虽然父辈识字不多,但耕读传家的传统伦理却在时时浸润着他。从牙牙学语到懵懂童年,从亦步亦趋的启蒙教育到因材施教的青春少年,特别是中学阶段对国文和写作的痴迷,真正使他开始走上自己的逐梦之旅。那时候,闲暇之余他便沉浸于舞文弄墨中:参加“文学社”;刊出《萌芽》壁报;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一些可以接触得到的文学名著……几乎所有青睐于创作的文学青年的激情之举,都被他认真演练操弄一番,这是他爱好写作的全面实践,也是他学习各种文体的一个锻炼机会,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并尝试向报纸杂志投稿。

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58年4月得到回报,他的诗文《炉边小唱》第一次在《南阳日报》上变为铅字,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对于他那是怎样的激动不已而又永生难忘的时刻。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周先生的第一篇。因为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在那个迄今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年份,崇尚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不必个体反思甚至不用思考是那个时代的主色和时尚,任何时过境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事后诸葛亮式的阐释,都没有多少客观的借鉴意义。所以,即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一定利于文学的生长,但周先生依然对自己这篇见诸报端的处女作“觉得有模有样的委实漂亮”,他“禁不住欣喜若狂,如痴如

醉”。文学使他沉浸在想象和创造的快乐中，替代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更多实惠的一些想法。但于他来说，无论怎样，侍弄文学才是他的真爱，与之能否长相厮守姑且不论，但那份对文学的挚爱却不必质疑，毕竟邂逅缪斯女神并得到眷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可为和可遇的幸事。

我猜想，激情和躲避不开的意识形态，对他最初创作很可能有着双重的促进作用，否则，那篇处女作不可能诞生在全民轰轰烈烈的捉麻雀运动中。这个不可小觑的开端，或许成为了他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和毕生从事写作职业的最初诱因。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三十余篇诗歌、散文。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阔步前进的时候，命运之神却给他开起了玩笑——这时，急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情形下，现实中每个要食人间烟火的人都不可能“躲在小楼成一统”，更何况对文化人有着特别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在那种“越来越好的喜人、逼人形势”中岂容他抽身之外袖手旁观。所以，当他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文学创作的曼妙滋味时，就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运动裹挟和牵连上，一下子从享受创造文学的快乐高潮中跌落下来，主动发言变“被发言”的无奈，使他只有受批挨斗之份，没有还手回击之力，任你百般辩解，遭遇“白专典型”的批判而备受不公却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这十年的蹉跎岁月中，他不但作家梦难以为继，而且原来发表的作品又招致“清算”，这住牛棚、写检讨的尴尬和“始得名于文章，始得罪于文章”的翻云覆雨，恐怕仅用政治原因不好文过饰非、一笔带过，肯定会有人性中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趁机从中作祟。

在时势造英雄中，固然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很多时候起质的决定作用的却往往是天意，人到底抗争不过命运，时运如此，为之奈何。这时，他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育人，这种为谋生从事的职业以及他后来家庭生活的角色转换，丝毫都不能动摇他最初的抉择。尽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环境几乎阻断他专心致志进行创作的各种可能，一切的底色都变得红彤彤一片，所有的事情都能与政治搭边，耀眼的光芒遮掩了本该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时势如此，而且对文学欲罢不能和没处发表作品的苦闷也在时时困扰折磨着周先生。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踏入社会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世道人心在特定环境下的极端表现，更从社会这部无字



大书中愈加看清了人性嬗变的诸多方面,因而,纵然暂时失意但难以撼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

虽如此,他唯有像多数身处逆境中的人一样去耐心等待和韬光养晦,在修为养性中坐看风云变幻、常思世事变迁,在磨砺和持守中拒绝沉沦、艰难抗争。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岁月流逝虽然销蚀着铅华,但终将大浪淘沙、真金必现。只要精神不倒,他就会依然挺立并前行在文学世界的畅想中。于是,读书思考、行文练笔、向内挖掘成为他提升素质的必修课,他坚信,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希望,好梦必定成真。

在期待和守望中,他迎来了文学的春天,也开始了他写作的第二春。当然,刚刚经过“文革”的他,即便没有了意识形态禁锢的余悸,但思维的惯性也不可能使他对写作形式很快地表现出浓厚的前瞻性的兴趣,更何况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没有更多可供借鉴的阅读来引领他的写作。所以,继续秉持杨朔散文模式仍然是他及那个时代的必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空前解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想逐步被介绍到国内。单一的、理性意义上的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正在受到观念意识不断创新的挑战,原来仅仅用认识论来观察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呈现出更多另类的面孔,文以载道也因“为生命而艺术”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多元文化和各种文体形式的出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能够挣脱传统散文写作模式的束缚,这些无疑改变着他的创作观念,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他思想的日益丰富也使自己呈现出井喷状的写作态势,这种情形下,多个单篇发表的文章有了结集的可能。于是,继1986年他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乡间小路》后,接二连三地出版了《葫芦引》《情歌·挽歌》《铃铛》《唱给文学的恋歌》《绿窗小品》《皇天后土》《桥的呼唤》《周同宾散文自选集》《周同宾散文》等。在这段创作的丰沛期,不仅散文的艺术表达达到了新的高峰,而且,始终真诚地描摹农民生活成了他创作的主调。此时的他说,“我的散文,便是唱给农村生活的一曲绵绵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论唱得好坏,自信歌里尚有一颗真心”。因此可以说,是农村题材成就了他,

是父老乡亲的真实生活打动了，他也成了农民永远的歌者。

其实，一直以来，对于血脉里流淌着农民的血和有着很深农村情结的他来说，农民和农村生活几乎成了他歌之不尽、咏之不竭的创作主题和重要精神源泉，相比以往，也许这时的他才算真正找到生存的坐标，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时机。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时代，发愤努力、勤奋耕耘而且佳作不断，连续在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散文八百余篇，多篇作品被收入全国性散文选本或被文摘报刊转载，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而介绍到国外，并获奖二十余次。

休谟说：“哲学中有一条一般的原理‘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原因’，这个存在的原因决定了始与终的统一。”世事固然难料，但最终都要回到或接近最初的出发点，这似乎可以用作阐释悖论。世上许多不易察觉的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并给人留下悬念，周先生之文学造诣既是一种偶然又是一种必然，他偶然在社会一个时段的文化塑造中，必然在他个人的天赋和勤奋创造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及他的作品虽然是时势造就的结果，但他的创作本身却是极具个人化的精神创造。他在这种创造中并不刻意于那种缺乏心灵呈现的纯粹形式变换，也从不把玩艺术，而是对生活 and 文学自始至终投入真情实感，更多的是在语言锤炼中探索个性风格，这决定了他必将以最为适当的语言技巧来本质地表达本真的现实生活，这是他能够每每写出令人萦心牵肠文字的缘故，这文字鲜活、深沉富有质感，感怀、犀利蕴涵诗意，绵延、醇厚耐人咀嚼。

事实上，一个作家从文学自发到文学自觉，大抵会经历一个从模仿生活再到高于生活的渐变过程，这中间，作家包括创作经验在内的精神世界都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剧变，并可能在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的相互促进中迸发出超验的奇异灵性。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比较成熟写作经验而又专一于散文创作的周先生，便愈发显得世事洞察、思想深邃、语言老辣，在他为我们呈现的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里，更多的是一篇篇质朴、厚重、枯涩、耐品的能“被称之为作品”的力作。

我们知道，包括元小说在内的后现代派小说由于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差异性而淡化客体描述，在意语言的叙述本身，注重“回到文学本身”，这种



刻意于“怎样写”的写作影响甚至曾撼动了整个文学的传统基础。那么,作为以散文形式抒发情感的散文语言的表述究竟还能走多远,文字还能凭借什么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和永无休止的欲求。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作家的反应肯定各不相同。但很显然,周先生对技法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自有应对,他在创作中努力回归语言的天然、清新和淳朴,使“真”成为他散文的灵魂、透视人生的法宝和创造文字的基础。同时,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以及对中西方文明的鲜明对比,使他对现代农民精神有了历史考量的现实依据。其实,要真正理解“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就要明白它是对过于强调“文以载道”进行消解的本意,显然,这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但要真正理解“回到文学本身”,散文更应使感染力成为体现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借以抛弃大众经验和审美需求的口实,更不应据此使文本远离情感和心灵,在文字间做言不由衷、语不及物、句不及意的往来旅游。

当然,周先生能做到这些,也与南阳的小气候不无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正是后现代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完善阶段,后现代的多元视角颠覆和异化了现代主义那些系统化、规范化的东西,它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奠定了对差异的充分尊重和多样性写作的哲学基础,使文学的艺术个性的创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小说的形成来看,它所表现出的戏仿、拼贴和反讽,虽然存在割裂思想的语言碎片化倾向,但用尝试形式的变化来对抗正统和权威,使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估价值,获得剖析自我、直面人生的更多可能,也可以使我们更典型地反映荒诞的社会本身,满足人们的更大精神追求。而且它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以多元思维促使我们因看到事情的复杂而显得更有意义。所以,福柯相信“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这就有可能实现对霸权话语的更有力的批判,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语境。就这一时期的南阳文坛而言,后现代主义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代表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也曾风靡一时,为数不多的先锋创作和实验也折射出一些时代特点,但绝大多数作家是现实主义手法,这同样也为周先生的散文本土化写作,提供了一个更加

宽泛的学习借鉴的适宜语境。

这样说,并不表明周先生安于现状和拒绝接受新思想、新形式。其实,一个要在文学之路走向更为高远的作家,如果要获得更大的创造力和自信心,就必然要有更大的勇气否定自我,而且要承载新的精神资源和指向新的思维向度,以遏制思维定式的僵化趋势。我们知道,人们的经验世界一个来自生活、一个来自内心,而高于生活的本真,其实就是来自内心的艺术感悟和心灵灼照的结果。周先生固然“不想取巧,而又……怯于维新”,且自认为“作品多没有巧妙的构思,缜密的章法”,但不想取巧的他在语言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比如他交替变化的长短句的节奏感、韵律感以及准确使用动词的敏感性,都成为他散文风格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标志。不想取巧不等于平铺直叙和没有构思,不等于对五彩缤纷的生活照单全收。他认为,“小说仗虚构、散文靠剪裁”,“散文写人,重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这,或许是他散文情真、意悠、不留雕琢痕迹的更高境界吧。事实上,周先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从《铃铛,丁当,丁当》到《豆的系念》、再到《桥的呼唤》,他用传统的文化记忆来激活和挖掘本土的文学宝藏,以独特形式体现周氏散文写作方式的改变,特别他的创新更多表现在对语言的个性化锤炼上,尤其他正视现代农民的精神世界并给予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关照,使他的散文创作走向了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更高层次。

不惟如此,“世间唯有想象:它们是唯一的存在,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认识自己”(费希特)。撇开意识形态不说,费希特的这句话,对我们认识文学模式、开拓文化视野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作用。诚然,文学创作的形式是最需要想象力的,它强化着我们试图改变生活的冲动和创造性,为我们统一精神与物质世界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制衡器。于是,周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自由奔放的书写时空中,想象是他组合艺术生活中真实人物和结构文本的黏合剂,是他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中蕴涵东方文化和契入西方精神的制胜法宝。这,足以碰撞并迸发出更为绚丽的思想火花,从而为文学创作产生新的裂变元素。

但毕竟,文学创新和一切创造一样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于周先生来说同样并不那么轻松,加之他由于“受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文学观念影响太深”,

所以,尽管他也曾“大着胆子变了几变”,但终归“有点儿万变不离其宗,差不多还是那么个模样”的味道,这如同文化塑造人的过程,虽然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理性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具体的言行却因观念意识的制约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长久的磨炼甚至是痛苦的蜕变才可能“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更因为,作家写出自己的特色不易,但改变既定风格,实现新的转换更难。正像巴赫金所言“在每一种新风格中都可以看到对某一既有文学风格的所谓反应因素,这种因素是一种内在的论战,也可以说是对异己风格的隐蔽的反风格化……”那样。尽管如此,周先生还是有意识地在《皇天后土》中尝试了新的言说方式并成功实现转型。当时,他为了获取素材,曾多次进驻农村而得以与农民近距离接触,努力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体味、挖掘农民的现实人生,并以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呈现给世人。从1989年《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其散文《饭场记事》开始,周先生相继推出了一批此类文章,最终结集出版了使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扛鼎之作——《皇天后土》。可以说《皇天后土》是他写作技巧和思想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及代表性作品,它所表征的不仅有语言创新和文体转换的意义,更蕴涵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世道人心沧桑巨变的沉重感。

历史告诉我们,话语权历来是社会阶层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的突出表现,掌控主流话语权的主体和言说方式的改变,某种程度上昭示着社会生活和语言风格的剧烈变化。而土地与国家的关系,早在《诗经·小雅·北山》中就有反映,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土地自古以来属于掌管国家“公器”的王所有,与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似乎关联不大,而且历史上话语权从来为占有土地的强者——统治者所专有。作为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文化人,周先生在尝试新的文学语言的同时,特别关注社会变革、文化递进中生活方式及人性的嬗变,其作家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在《皇天后土》中赫然为农民立言、颂德、讴歌,这种见识、胸襟和悲悯的人文情怀重塑了中国农民的历史形象,也由此使他为农民行使话语权的文本创造有了文化建构的意义。

他的《皇天后土》选取性格各异的农民,展示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事方式的差异而带来命运的迥然不同,再现了众生的悲欢、岁月的无情、大地的